

弘扬民族文化 致敬传承精神

『生命如歌——万桐书与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专题展在新疆开展

李海琪

8月23日,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艺术学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新疆理工学院、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的“生命如歌——万桐书与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专题展在新疆阿克苏市理工学院开展。作为2023年对口援疆19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的重点内容,展览选取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保护者角度展示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抢救保护传承的艰辛历程。展览分为“万桐书事迹”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及其保护传承”两个篇章,通过珍贵的图片、文字资料、实物、声音装置等,展示了万桐书抢救濒临失传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事迹,以及国家保护传承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成果。

从万桐书事迹看学术研究参与非遗保护

在“万桐书事迹”版块,将时间线延伸至万桐书的一生,以“十二木卡姆抢救工作的开端”“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成立”“十二木卡姆录音、记录、出版历程”几个重要节点,分单元展示以万桐书为代表的老音乐家们参与抢救保护木卡姆艺术的感人经历。

1951年,带着中央的嘱托和新疆人民的期盼,万桐书带着妻女一同踏上新疆这片沙漠绿洲,投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抢救保护工作。当时的工作条件较为艰苦,需要克服诸多现实困难,如电压不稳,录音工作只能在晚间进行,如此历时两个多月,万桐书等人完成20盘钢丝录音带的录制。此后,又用了两年半通过录音机逐句识谱记谱。木卡姆台词多为察合台语,研究团队还专门请人协助翻译,翻译整理出了全部歌词。1954年,随着供电条件的改善,添置了磁带录音机后,万桐书等人又对当时十二木卡姆唯一的传承人吐尔地阿洪进行了二次录制。1957年,为进一步做好歌词整理,邀请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尼米希依重新整理歌词,完成歌词整理和汉文词意翻译,万桐书还与邵光琛一起完成剩余散曲记谱,同时完成全套十二木卡姆乐谱和间奏曲的伴奏鼓点校对。1960年,以五线谱记录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乐谱两卷集终于由中央音乐出版社和中央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自此,世代以口耳相传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终于被记录纸面,得以永久留传。

此后,万桐书一直坚持研究木卡姆艺术,发表30余篇重要研究论文。1982年,万桐书带领工作组到哈密抢救“哈密木卡姆”及“伊吾木卡姆”,用两个月将录音的全套完整哈密木卡姆交给当地部门,进一步记谱出版。万桐书曾获得“木卡姆艺术家”“世界艺术功勋奖”等多项荣誉奖项。

1923年至2023年,万桐书百年人生历程中,他不遗余力地将心血奉献给了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事业。生命不息、研究不止,作为抢救保护木

卡姆艺术的代表性研究者,万桐书用实际行动助力非遗的抢救、保护与传承,令人深深感慨。研究者的参与,可以实现对非遗更加精准有效的抢救与保护,在较短时间内仅靠录音完成识谱记谱,将歌词翻译整理,完成伴奏鼓点校对等,研究者们用基本的专业素养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与时间赛跑,成为推进非遗保护传承事业的实力保障。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及其保护传承方式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及其保护传承”版块分为“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两个单元,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进行介绍。从木卡姆艺术在新疆的分布来看,这一艺术形式普遍存在于新疆各维吾尔聚居区的人民生活中,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也是维吾尔民间乐曲艺术的精华和民族精神的灵魂。2005年,新疆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8年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时,在2006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中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和哈密木卡姆4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维吾尔木卡姆肇始于新疆的民间文化,发展于各绿洲城邦国宫廷及都府官邸,经过整合与交融后又返回民间,既体现古代宫廷的精美文化,又展现出乡村市井的民间生活。承载着历史文化、理想追求、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多重文化意义,是我国丰富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承已岌岌可危,能够比较完整演唱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仅剩其家族第五代传人吐尔地阿洪,因为不识字,他所掌握的木卡姆演唱艺术全凭记忆。1956年吐尔地阿洪离世,使研究者们及时抢救保护的艺术成果更为珍贵。改革开放以来,新疆艺术研究所木卡姆研究室、新疆



木卡姆艺术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会等先后成立,在保护传承和学术研究方面予以大力推动,同时艺术团通过编创以木卡姆为主的音乐及歌舞节目,实现木卡姆艺术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木卡姆艺术,还将其列入高校艺术教育行列,不断培养演出人才。21世纪以来,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保护传承,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已列入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保护名录,国家级传承人12人,自治区级传承人11人。在多方力量的努力下,这一艺术形式真正“活”了起来。

从非遗的活态传承到非遗馆的活态展示,是非遗馆人一直以来研究探讨的课题。非遗强调活态传承,非遗博物馆展示应当努力实现这一精神文化内涵的表达,但其中的历史、文化、生活状态等,不是用一个人物、一件简单的物品可以表达的,这也是非遗展示的难点所在。展览虽难以将历史久远、形式丰富的非遗项目全方位展示出来,并用一些独特视角作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展览通过研究者侧面,将木卡姆这一艺术形式放置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层面,不仅让观众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展示出非遗的保护传承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将木卡姆艺术抢救保护传承中的关键节点和工作细节用文字图片等形式展示,使观众对这一无形的传承有了更加直观具象的认知和感受,了解其传承的重要性与来之不易。

同时,展览通过对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全面传承发展,对濒危项目抢救性保护的展示,呈现非遗项目的多元立体的传承保护结构,为非遗活态传承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案例。从研究方面贡献突出的人手,也是对非遗活态传承另一个层面的诠释,非遗事业传统的核心是技艺传承人,但也需要大量相关社会力量的辅助,研究力量可以为传承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方式,博物馆可以将成果转化,让更多人认识非遗、感受非遗并参与非遗。



图1 贮贝器上的牛图像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滇昆明卷》

图2 立牛立于铜鼓之上的造型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滇昆明卷》

图3 牦牛祭祀铜扣饰(李家山M68出土) 引自《云南文明之光》

西南地区出土青铜礼乐器上的瘤牛与骑马纹饰

韦姗杉

动物纹饰是中国传统文化纹饰的主要母题之一。古人在玉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皮革纸卷上塑造的动物图像,反映着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人群的业生产模式、信仰习俗、互动交流等社会面貌。

中国西南地区位于边地半月形传播带的重要区域,是古代南北和东西方向民族迁徙的通道和文化交流的枢纽。西南地区出土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多见于铜鼓、贮贝器等青铜礼器上;主要有牛、马、虎、蛇等动物形象;纹饰造型主要有平面、立体等形式,风格有具象、抽象等类型。动物纹饰或单独出现,或存在于驯牛、畜牧、骑马、搏斗、征战等场景图像。白鸟芳郎、邱兹惠、张增祺等学者对此区域青铜器动物纹饰的来源和运用多有论述,指出滇文化与斯基泰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等存在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等互动模式。美国艺术史家艾玛·邦克则提出,西南地区出现动物纹只是“趋同作用”下的共通形态,两地风格并不一样。这些研究主要对动物纹饰的来源展开探讨,对纹饰与社会生活变革关联的研究着墨较少。本文以西南地区出土青铜器上的瘤牛、骑马等形象纹饰为例,探索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交流互动轨迹。

动物纹饰在西南青铜礼乐器上的运用

动物纹饰在西南青铜礼器上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写实性动物立体塑像装饰风格和动物纹饰母题的运用。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铜牌饰、兵器、贮贝器、铜鼓等青铜器物常见写实性的动物立体塑像等草原文化装饰特征。例如贮贝器器盖上,铸有圆雕的牛、马、虎等写实动物。根据器型、铸造工艺可知,此类器物是将我国西北地区传入的立体纹饰铸造技术和动物图像风格运用到本土传统青铜容器上形成的融合型青铜礼器。这是源自对草原文化的观念认可和技术交流,并进行了创新利用的产物。

动物图像主要有牛、虎、蛇、鹿、马、羊、猴、飞禽等,其中以牛的形象居多。据初步统计,贮贝器器盖上以牛为主题的立体塑像出现年代较早,所占比例大于其他动物图像(图1)。同时,在多数大型墓葬中多发现有铜

牛头、真牛角等与牛相关的随葬品。例如晋宁石寨山M1中,除了同墓随葬的铜牛头和真牛角外,贮贝器5件器物中有4件器盖饰有立体牛塑像,铜鼓也有线刻的“巨角野牛”形象。从这些以牛主题形象装饰的墓葬出土器物可见牛纹饰元素在滇文化中盛行。在青铜礼器上,滇人还着重突显巨角独峰的瘤牛形象,或把牛的形象铸于器盖中心的突出位置或立于铜鼓面上(图2)。通过特写、烘托等手段强化牛的形象,突出表现牛的气势,反映了滇人对牛的重视和崇拜。

由此可见,贮贝器器盖上铸有写实动物立体纹饰的装饰风格,是将北方、西北地区传入的动物图像风格和立体纹饰铸造技术运用在本土传统的青铜容器上形成的创新性文化特征。这种器物改革折射出西南人群对外来文化的装饰艺术、铸造工艺、族群信仰等的吸纳和改进,体现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兼容与并存。

动物纹饰折射的区域互动

我国西南、岭南地区北邻欧亚草原,西近西亚,南连东南亚,拥有独特的边地区位优势。区域内出土有草原风格青铜器、铜扣饰、带柄铜镜、蚀花肉红石髓珠、钙玻璃、鎏金银盒、海贝等器物。董恩正、张增祺、霍巍等学者结合文献提出,这些舶来品部分是通过贸易交换得来的,部分是本土人群用外来传入的技术在本地制作的。我国南方地区与中亚、西亚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在战国时期就已初显雏形。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建立的对外贸易官道也是建立在这些民间商道的基础上。民道和官道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央政治体制与西南民间族群在两汉时期围绕“交通西域”形成的互动格局。动物纹饰尤其是瘤牛与骑马形象的运用,是不同区域文化互动的体现。

瘤牛纹

牛图像多见于畜牧、驯牛仪式(图3)、农耕(图4)等中国西南地区青铜器图像场景中。在滇文化大型墓葬中多见随葬有牛头、牛角等遗骸,鲜见其他部位骨骼的葬俗。由此推测,如同中原地区的祭祀用牲制度,牛是高等祭祀仪式性用牲和仪式性宴饮活动中的主要

肉食资源。

结合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可知,从境外传入的黄牛,即普通牛(Bos taurus)和瘤牛(Bos indicus),以及水牛(Bubalus bubali),经过本土化驯养和畜力开发后,为重要的肉食来源、祭祀用牲、畜力农耕资源。西南古代先民对牛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优化了人群饮食结构,促进了生产发展,推动了社会生活变革。

铜鼓、贮贝器上的“巨角独峰野牛”图像为瘤牛。在文献中关于瘤牛的出处,一说提及中国西南地区,晋郭璞注《尔雅·释畜》“犛牛”条言:“即犛牛也……今交州合浦徐闻县出此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明瘤牛是汉代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中央王朝的贡品;另一说提及西域,《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国》载:罽宾国“出封牛”;《后汉书·顺帝纪》曰:“疏勒国献师子、封牛”;《晋书·张骏传》载:“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可知在汉晋时期瘤牛是西域进贡中央的贡品。

基于目前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成果,瘤牛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特有牛种。瘤牛的驯化起源于公元前7000年的印度河流域。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其形象始见于距今2400年的中国南方地区的贮贝器、石寨山型铜鼓。结合石寨山墓地出土铜牌饰牛圈图像(图5)可知,瘤牛应该在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引入滇文化区域,并进行圈养驯化。现代瘤牛DNA研究和考古学资料也暗示,中国家养瘤牛由印度及东南亚传入,云南很可能就是中国最早引入瘤牛的地区。从印度河流域到我滇池地区的传入路线是单线还是多线的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是通过文献可推测当时瘤牛的来源有直接从外地引进、本地驯养繁殖两种途径。

骑马纹

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研究,南方地区使用、驯养马的时间较晚,上限不早于青铜时代。通过贮贝器可见,马的形象一般出现在征战、畜牧、纳贡等场景图像中,数量总体相对较少。石寨山M71:142叠鼓形贮贝器呈现了一幅生动的狩猎场面(图6),马是狩猎生产中重要骑乘驮载工具。石寨山M13:356贮贝器器盖上铸有

立体的战争场景图像(图7),马为骑士提供了重要的武力协助和动力支持。由此可见,对马资源的利用主要为畜力开发,应用于狩猎、战争中。

生物学研究成果显示,高热潮湿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不适合马的生产和繁殖。结合考古成果研究可知,青铜时代南方地区的马资源为稀缺、珍贵资源。晋宁石寨山M13:2叠鼓形贮贝器下鼓鼓面所铸场景描绘了滇人与其他从事不同业生产模式的族群交流活动(图8)。马匹可能是通过类似的纳贡或交易等形式引进西南地区。

通过考古成果和器物研究可见,西南地区牛、马资源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的功能各有侧重。对这两种动物资源的利用体现了古代族群对外来资源利用和改造的能力,也从侧面反映了南方地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都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以及交融的前沿地带。其区域文化发展历程可见广域地区之间人群互动脉络和社会文明化进程。贮贝器、铜鼓是古代南方地区典型的青铜礼乐器。在滇文化大型墓葬中,贮贝器一般与铜鼓组合出现,且借用、改造铜鼓的铜鼓贮贝器、仿造铜鼓的铜鼓形贮贝器和叠鼓形贮贝器贯穿贮贝器的兴衰过程。贮贝器、铜鼓等青铜礼乐器组合及其纹饰记录着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族群的信仰、礼仪、习俗,对铜鼓的改造行为及贮贝器的兴衰演变体现了不同族群之间礼制传统的差异,折射出区域内族群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历程。铜鼓、贮贝器的纹饰主题出现瘤牛、骑马等形象,更是体现了中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与欧亚草原文化区域、印度河流域等广域文化交流和人群互动。

综上所述,在青铜文化传播和农业传播浪潮的影响下,西南古代族群选择性地利用有利资源,进行生产力和业生产模式的变革;西汉时期,随着郡县制在西南地区的设置,西南族群的生活习俗、葬俗传统出现了滇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文化因素,呈现了多元一体、兼容并存的文化面貌。由此可见,西南古代族群在外来文化影响下进行的社会生活变革、社会转型和韧性升级折射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图6 石寨山M71:142叠鼓形贮贝器器盖上的狩猎场景图像 引自《云南文明之光》

图4 变形羽人纹铜鼓上的牛拉轭纹饰 王梦祥/摄

图5 铜扣饰中的牛圈图像 引自《云南文明之光》

图7 石寨山M13:356贮贝器器盖上的战争场景图像 引自《云南文明之光》

图8 石寨山M13:2叠鼓形贮贝器器盖上的场景图像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滇昆明卷》